

“聆听伙伴”:一项可资借鉴的社区心理学 工作项目

张爱莲,招清,李霞

(山东理工大学心理科学系;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聆听伙伴”是一个融合了女性主义思想和社区心理学原则的干预和行动研究项目,支持对象是美国偏远农村的低收入欧裔妇女。项目开展的背景是由于许多社区女性长期被忽略,不具有话语权。目标是使参与者体会到思想和表达的力量,并通过这种经历带动更为广泛的个人和团体交往,使她们以互助、互敬和自立的方式生活。项目的实施过程首先是参与者的选择与邀请,然后是同辈小组活动的具体开展,包括指导参与者进行反馈性对话、为谈话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多种形式复述参与者的观点、指导参与者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形成和发表参与者及其孩子的成长故事、为参与者举行结业典礼。每个具体的聆听伙伴项目开展的时间为两年,对项目的效果评估显示,参与者在认知方式、社会支持和生活状况等方面均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一项目对于我国女性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心理支持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聆听伙伴;女性;社区心理学;同辈小组;心理支持;效果评估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5)06-0001-10

“聆听伙伴”是一个预防性、促进性的干预和行动研究项目,融合了女性主义思想和社区心理学原则^①,旨在培育女性团体,促进个人发展。项目所支持的对象是美国偏远农村的低收入欧裔妇女这一弱势群体。该项目受到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公共卫生署妇幼保健局、梅尔曼家庭基金会和本德海姆基金会资助。在实施过程中,项目组借鉴了一些传统的相关项目的经验,为促进女性团体、同伴、家庭和个人的成长,而致力于改变她们的环境和提升她们的个人技能^②。在我国社会,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类似的关注和支持。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女性农民工就是一个应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庞大弱势群体。本文拟对“聆听伙伴”项目的背景、目标、实施过程及效果评估等加以介绍,以期为我国女性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心理支持工作提供借鉴。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IA130316)

作者简介:张爱莲,博士,副教授(E-mail: zalbell928@163.com)

一、“聆听伙伴”项目的背景和目标

“聆听伙伴”项目的支持对象是美国偏远农村的低收入欧裔妇女,目标是使参与项目的年轻妈妈们体会到思想和表达的力量,并帮助她们的家庭和朋友直至社区最终都做到这一点。

项目组之所以确立这样的目标,是因为有一些报道称,许多社区女性长期被忽略,她们不具有话语权,自愿地也是被迫地保持沉默。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对她们自己有着相似的描述。例如,一位 25 岁的农村欧裔低收入女性,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样描述自己:“我常常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我没有任何意见。当我确实有什么想说的时候,我也不能说出来。就算我说了,也没有人会听。所以就是这样,我像在一条死胡同里,我只能闭嘴。”

很多社区女性都描述了一种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感觉,这种感觉环绕着她们,让她们觉得不舒服,和他人有距离感,并且无力改变自己和他人,包括她们孩子的生活。贫困和女性身份使她们处于男权社会的底层,无论是在家庭、人际关系中还是机构、社区,很少有人想到她们可以以其他方式存在。因此,有些女性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不被承认、不受支持的,以至于让她们怀疑自己和自己经历的真实性。比如一位有着两个年幼孩子的贫困欧裔女性这样说:

“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在做梦。很多时候我都没办法告诉别人我的感受。我知道这种感觉很不好,但好像没有人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觉……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吧。我可能是个怪人,我也不清楚。”

由于缺乏支持,她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人际之间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阶层歧视和其他有关的伤害,她们的生活会是怎样,很多人只是责怪自己孤僻、软弱。虽然有些人也能认识到所处的社会体制存在的局限,但她们对于明确表达这种不公正感以及采取什么行动几乎不抱希望。

“聆听伙伴”项目借鉴了叙事理论与方法,在构建同辈团体的背景下,为高质量、有反馈的同伴对话提供机会和传授技巧。项目负责人希望社区女性通过参与活动,能把自己定义为“主动的理解者和潜在的合作者”,同时也能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其他团体成员以及她们的朋友和孩子,并希望通过这种设置和经历带动更为广泛的个人和团体交往圈,最终带动社区,使她们以互助、互敬和自立的方式生活。

二、“聆听伙伴”项目的实施过程

(一)项目的参与者

每个具体的聆听伙伴项目开展的时间为两年,每年邀请一组新的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参与。这些女性都来自美国佛蒙特州东北部两个毗邻的县,具有相似的贫困度和人口密度。小型家庭农场一度是这一区域的经济支柱,但现在多数已经荒废,或是被大型高科技企业(拥有者多数是州外投资者)合并。很多社区居民只接受了有限的正式教育,有的从事服务业,有的是收入颇低、缺乏安全保障的农场工人。聆听伙伴项目选取的这两个县都以严重贫困、高失业率和高青少年怀孕比例高著称,关于虐待和忽视儿童、殴打妻子和酒驾指控的报道也屡见报端。

项目邀请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女性参与:(1)年龄在 14-34 岁之间;(2)至少有一个 6 岁或

6岁以下的孩子和她一起生活;(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生活在偏远农村;(5)被一个或多个相关机构认定为缺乏家庭支持、有虐待和忽视儿童倾向,或承受巨大压力;(6)没有参与同辈群体、互相或自助小组的经历(目的是尽可能把最边缘化的人包含在内)。项目依靠积极参与社区日常生活的个人、专业人员和机构帮助识别和寻找潜在的参与者,同时邀请有兴趣参加该项目的女性向项目组介绍她们所属社区中符合条件的人,并与这些人也进行了联系。

当项目组第一次通过电话或当面邀请女性参加这个项目时,告诉她们之所以开展这个项目,是出于对许多母亲的沉默、孤立、不能倾诉和不被倾听这种现象的关注。项目组成员向她们说明,该项目能够帮助社区女性定期聚集在一起,诉说经历,分享故事,并设法帮助她们获得实现自己目标的资源。项目组强调,很重视她们个人和集体的故事与经历,并且认为这种分享能使社区内外的人们和研究机构受益。

在每个具体项目持续的两年中,项目组登记了聆听伙伴干预项目的30名参与者,另外还登记了30名未参加项目的女性作为对照组(总共60人)。对照组与参与组在年龄、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孩子的年龄和数量、生活条件、收入来源及数额、种族、宗教、就业情况和受教育程度上相匹配。对照组的女性不参加每周一次的聆听伙伴同辈小组见面会,但参加了项目组所有的访谈和评估活动。

(二)同辈小组的活动

每个聆听伙伴小组连续8周开展活动,每周进行一次见面会,每次三小时。总共有6个小组(每两年3个),每个小组包含大约10个社区参与者和2个小组负责人。小组活动在教堂地下室、学校附属建筑或家庭中心等舒适环境中进行。由于很多参与者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项目组帮助参与者安排往返的交通,并安排社区外的人在小组见面会附近进行儿童托管。

小组负责人由居住在社区或在社区进行过基层工作的专业女性(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医疗服务人员)担任。负责人的任务是鼓励和引导小组活动,帮助参与者认识到她们自己和小组的力量、需求及权利。

为便于参与者和小组负责人能够对活动的整个过程做出反思,项目组对每个小组见面会都进行了录音。在每周的同辈见面会结束前,参与者要集体对本次及前几次的见面会做出反思,并对下周的见面做出计划。

所有的项目协调人和同辈小组负责人互相之间每周也要见面一次,对同辈小组进行点评和计划等活动。两个小组负责人要对他们负责的小组见面会做记录。项目协调人和小组负责人一起对每组的对话、活动和新计划做出评估,并对总目标和未来见面会的方向进行讨论,项目组还为同辈小组活动拟定了大纲。

1. 同辈小组参与者的对话

反馈性对话是同辈小组活动的核心,它使参与者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发挥作用,促进朋友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团体的发展。在小组活动中,参与者可以说出自己的经历,并将它们做为谈话的中心和起始点。这种体验对贫困的农村女性而言相当陌生。反馈性对话为她们提供了被倾听的机会,她们自己的话和她们面对的现实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参与者从了解他人最好的想法和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意见和思想上的成长。这种高质量的反

馈性对话对于养育者来说是一种重要能力。仔细倾听、思考并给他人回应,需要耐心、时间、关注、分析,以及信任和尊重的对话,并需要优秀提问者所具备的高度敏感、富有建设性的问话(如:“你的意思是?”和“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这些技巧需要培养才能掌握,尤其是对那些极少有机会参与相互尊重、互惠互益的交流的人。

2. 为谈话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小组从一开始就考虑了环境和设置的安全问题,每个小组都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以确保所有参与者感到安全,按个人步调行事和参与坦诚的、互动的建设性对话。同辈小组的负责人也把她们与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感降到最低,使项目参与者都能表现真实的自己。而且,小组负责人在所有小组成员当中强调包容、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助的关系。

例如,一名参与者这样说:“在聆听伙伴项目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不是唯一有问题的人,并且我们也不是在比谁的问题更严重。实际上就像是每个人都在尝试着帮助别人走出困境。”

3. 复述这些女性的观点

为了使每位女性的观点和意见以及她们的发展变化受到更多重视,项目组采取了一些方法来“复述”这些女性的话,以反映她们在一段时间内的转变。(1)为鼓励参与者反思和重述,项目组尝试让她们在小组对话中重复另一个人的话;(2)受参与者读写能力的限制,项目组给每个参与者发了一个录音机,参与者可以在小组或家里使用,记录、重放她的想法和小组讨论的内容;(3)由于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能阅读自己所说的话,为进行反馈和修正,项目组转录了部分小组讨论和个人故事叙述的录音文本,在下次见面会上发放;(4)为使小组成员能在活动过程中评论大家的想法和观点,项目组印制了对话的书面记录,并放置在小组会面的房间各处。随后又印制、分发了小组对话中反映特定主题和活动的部分,使小组成员可以重新审视她们的活动成果;(5)项目组向参与者发放了包含她们的录音文本、日志记录和其他活动记录的文件夹,通过定期的回顾,参与者可以从她们的思考和被记录的行为中发现自己的变化;(6)叙述是人们了解自己生活和经历的基本工具,已被证明对了解女性及她们的社会经历尤其有效³¹,因此,项目组设计了女性可以轮流讲述她们生活故事的环节,并对这些部分录音。

所以,尽管参与者经历了长久的沉默生活,她们还是通过很多方式看到和听到了她们自己的想法和故事。最初,很多人对于在小组见面会上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表示非常惊讶。有些人对自己思虑之多感到吃惊,也有人担心自己话语的“正确性”。总之,她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自身话语和观点的价值和意义。

4. 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同辈小组的设计考虑到了营造环境、培养能力,引导参与者以思考者和问题解决者的身份进行思索,并在一个思考者群体中了解、欣赏她们的同辈、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社区成员。各小组讨论了使她们感到尴尬或难堪的经历,让她们了解到,一个人自己眼中的缺点在他人眼中常常是大家共有的、可以理解的、很多时候是可解决的问题。

从优势的角度看,女性可以相互帮助,去面对那些她们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或挑战。项目组特别强调,人们常常忽略或低估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己提出的解决办法。受 Shure

和 Spivack 的启发^[4-5],项目组进行了问题解决练习,包括从认识问题、明确目标,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观点,再到评估不同选择带来的后果,最后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在内的一系列内容。随着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越来越放松时,小组成员提出某个担心或顾虑,她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以下方法,即按照小组要求把顾虑根据所张贴的主题归类。对于女性在问题解决过程的每一步分工合作,项目组都会把她们的观点添加到那些张贴的关于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记录当中,然后每个人都能阅读到这些合作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成果。在项目结束时,一位参与者说,“聆听伙伴”项目“帮助你发现从前被你忽略了的自己……因为平常不会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而她们是在帮你看清你能做什么。”

5. 形成和发表个人成长故事

在培养女性良好倾听和谈话能力的过程中,成员两两合作,或在小组和大组中引导和录制他人对自己成长故事的讲述,这些故事涉及到人生目标、个人能力和在现有价值体系中不被承认或被无视的成就。项目组积极关注这些女性正在增强的力量,并且关注社会环境的力量和影响,以及认识和重塑环境的策略。

借助于同辈探索和小组活动的支持,为了便于修正和反馈,这些故事被转录并交还给讲述者。在得到她们允许的前提下,有些故事被拿来与其他的聆听伙伴小组、开设成人教育课的学校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分享。“发表”故事鼓励讲述者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自己,对她的真实经历进行构建、命名,并且以可供别人参考的形式保留下来,对这些女性来说是一种很特别的经历。

6. 形成和发表儿童成长故事

与发表个人成长故事相似,项目小组针对参与者的孩子的成长和成就,对参与者进行访谈,引导并支持每个女性回想和讲述她孩子的天赋、能力和成就。这些故事被转录后,每个讲述者都对自己的故事进行了编辑,为孩子把故事制作成一本插画故事书。

7. 结业典礼

项目组为参与者举行了结业典礼。随着同辈小组见面活动接近尾声,参与者轮流关注每一个小组成员,每个女性都表达了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小组成员的感激。她们所发表的评论被转录到每个人的结业证书上。这些女性都体会到了这个小组对自己的重要意义。多数参与者都有了一种从社区边缘走到充满思考和关爱的社区中心的感觉,这正是由于她们的讲述为个人故事、相互支持、积极改变和集体行动提供了一个富有意义的环境。

三、“聆听伙伴”项目的效果评估

(一)项目评估概要

本着女性主义和社区心理学的精神,项目的研究、评估方法成为了该项社会行动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涉及项目的社区协作、干预、计划和发展过程。因此,这些方法和项目价值、目标、策略以及项目参与者、协调人和同辈小组负责人的经验密不可分。

“聆听伙伴”项目的每个参与者和对照组成员都在三个不同时间段,在自己家里(或由她们选择的其它地点)接受了访谈。三个时间段分别是:刚刚加入项目时(干预前)、持续 8 个月

的干预小组结束时(干预后)、干预结束 10 个月之后(追踪)。这些访谈以下列形式的对话或交谈为主:(1)探索女性在以下方面的认识和看法:对知识和真理本质的理解、对自己和孩子作为认识与理解者的看法,以及是哪些人和经历影响了她对这些概念的理解;(2)对项目参与者考虑和处理日常生活中实际冲突的方式进行结构化讨论;(3)对社会支持的标准化测量;(4)对自尊的标准化测量;(5)在干预后和追踪阶段,项目参与者还完成了一个“变化清单”:涉及每位女性现在和过去的生活环境、教育和受训经历、健康和医疗、住房、对社区和保障机构的参与等方面;(6)针对参与者的个人目标与计划以及对她的生活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进行结构化讨论。

在同辈小组见面会的过程中,项目组每周都进行信息收集。小组负责人要进行录音,对每次见面会的活动内容、动态、突出的个人贡献以及小组成员的转变做周记。每周的小组见面会都以对会谈的点评作为结束,在每次会谈中,参与者都要就大家对谈话、活动和会议焦点的反应进行讨论。大家谈论新的发现,活动对她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什么内容帮助最大,什么内容帮助最小,并探讨原因。这些信息对项目进展和评估都很重要,项目参与者积极参与了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二)干预效果

由于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有的参与者未能参加所有的小组会谈,为了后续的分析,只要参加了总共 34 次会谈中至少 5 次的女性,均被认为是“干预参与者”(共计 41 人)。项目组通过认知方式访谈、家庭社会支持量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前面提及的“变化清单”对干预效果进行了评估,参与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认知方式、社会支持和生活状况等方面。

1. 认识上的变化

统计分析显示,干预项目参与者比对照组成员表现出更大的认识上的收益。许多参与者都说越来越体会到思考和表达的意义。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我已经学会了想出一个主意,并且我可以说出我的想法。”另一位参与者则说:“现在我可以从我的生活中得到想法……我用我的头脑和我的心思考……我喜欢首先进行思考,以弄清楚某件事情是否适合我。”

最初在认知方式上以沉默和被动接受状态进入干预项目的参与者,不仅表现出比对照组更大的认识上的成长,而且在随后的 10 个月追踪期间,她们在认识上仍然保持着较大的收获。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参与者的技能和理解能力都得到了发展,这会帮助她们建立和培育支持性环境,以支持她们自己和他人的发展。也就是说,即使在没有了持续的正式支持小组的情况下,她们自己也可以充当发展推动者或“小组负责人”。

例如,许多女性把友谊看成是更加多方面的,并且对成长很重要。正如一位参与者解释的那样,她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朋友,但现在她有了,并且成为一个思考者,这对她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我的朋友们对我来说很重要,她们让我开始思考,因为我必须回答她们的问题。我的聆听伙伴让我知道,我是有想法的,这些想法以后也许可以用到。”许多参与者都说,她们很高兴,因为知道了她们可以对朋友有帮助。例如,在追踪访谈时,一位参与者说:“我知道我能够帮助小组伙伴为她自己说话,做她真正想做但并没有做的事……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比以前更喜欢为别人做事……在这之前你不会看到我这样做,那根本是不可

能的。”

很多女性谈到她们培育家庭环境的新能力,使家庭环境能够促进更多经过思考的对话和反馈。例如,在讨论她的婚姻时,一位参与者说:“我们比过去谈论更多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曾经忽略对方,其实并不是,这很难解释。我们过去习惯或多或少地用自己的方式行事。当他离开时,我就被困在家里。现在,他留在家里时,我们把话都说出来,我们不逃避任何问题。我不能说他真的能彻底掌管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有问题,他会帮助解决的。”

还有更多的女性谈到,她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培养和孩子之间相互帮助和尊重的关系。在项目开始时,一位参与者认为,父母的角色是充满说教的,需要一步一步地指示,她与女儿之间很少有合作的余地。一年半后,在接受追踪访谈时,她解释说,她需要和女儿交谈,而不是不停地对她唠叨。她说:“我会在那儿像个朋友一样,谈论任何她想谈的事。因为我认为,如果她觉得不能和任何人谈事情,她会感到孤独,然后她就难以解决问题,就不能思考这是怎么回事。”

总之,个人认识上的变化和参与干预相关,这种变化随后可能促成家庭、同辈的变化。随着参与者越来越多地参加社区组织,最终便可能促成社区的变化。

2. 社会支持、自尊和生活状况变化

针对社会支持的方差分析表明,干预参与者从干预后测评到追踪阶段所报告的可得正式支持数量增加,而对照组女性在此期间所报告的可得正式支持数量则有所减少。这表明,干预参与者已经能够更好地从她们所在社区找到正式的社会支持了。

从自尊方面来看,统计分析显示,干预参加者与对照组女性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的测评分数上没有显著差异。而从生活状况来看,与对照组女性相比,有较大比例的干预参加者表示,她们的住房状况保持不变或有所改善,而不是变得更糟。干预参与者在追踪阶段也不大抽烟了。另外,干预参加者中没有驾照的所有四位女性在追踪阶段都说,她们目前正在争取获得驾照;而对照组没有驾照的17名女性中,仅有8名表示,她们目前正在这样做。

3. 关于生活变化、自尊和社会支持的叙事主题的总结

项目组还对评估阶段所做的访谈进行了定性分析。对参与者干预后和追踪阶段的访谈进行分析显示,有一系列很明显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自项目开始以来,参与者在过去18个月中,她们的生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主题显示了自我形象、相关机构和支持网络的变化,项目负责人认为,这些变化很难通过标准化量表获得,而通过访谈则可以更好地呈现。“聆听伙伴”项目参与者反复报告,说她们感到更加自信了,并感觉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她们觉得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照顾自己,为自己说话,认真对待自己的需要,同时也考虑他人的需要,用策略解决生活问题并帮助别人。她们学会了认真思考事情,而不是冲动行事。例如,一位参与者这样看待她自己的转变:

“对于事情我会想得更多,看它们是否可以改变。如果可以改变的话,我就会想,我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他们。如果不能改变,我就会努力想出应对它们的办法……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类似的事情……现在我关心别人和我自己。我有了新的自信——那就是我能把事情做

好,而且我有权利这样做。”

另一位参与者也描述了她生活中的一些变化:

“我想我已经长大了。我更加认真地对待生活,我能够更好地处理问题了。以前,每当问题来了,我只是觉得难以接受。现在,在我投入事情之前,我会思考该如何解决,我会从自己的过去吸取经验。我意识到我有能力改变我不喜欢的事情……过去,我的生活控制着我;现在,我经营我的生活。”

参与者还多次提到一种新感觉,就是觉得自己有了结交朋友和成为朋友的能力,以及通过友谊促进个人成长的能力;有了支持孩子和伙伴发展的能力;不再那么害怕寻求帮助了;有了与其他人分享许多生活经验的自信;对生活中使自己感到局促和压力的人、态度和事件,不再为之自责。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我们在一起解决问题,这样就不会感到很孤单。”

在追踪访谈一年之后,项目组邀请聆听伙伴参与者团聚。有大约 25 名女性参加了聚会,在半结构化小组的形式下讨论她们的生活。项目组把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的总结提供给她们。参与团聚的小组成员举了许多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和证实这些转变,包括她们开始在社区的更多公共领域成为领导,积极参与社区志愿组织、网络或一些委员会的工作,比如参与她们孩子学校和社区的教育团体以及妇女庇护所的工作等。通过这些讨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协作伙伴支持的力量,解决问题、采取行动在参与者的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而这就为更多系统性的改变提供了基础。

四、关于项目借鉴的思考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各种矛盾的多发期,也是人们的心理敏感期。有研究者认为,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不仅需要通过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来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需要通过多方共同努力来提升人们的心理素质^[6]。对于面临经济和心理双重困境的城市流动人口,有研究者建议设立流动人口心理服务机构,向流动人口提供心理援助^[7]。用人单位也需要关注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多重需求^[8]。还有研究者提出,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提出以社区为平台,从个人、小组、社区层面开展工作的模式^[9]。

有调查显示,24.5%的农民工感受到“社会关系少,情感孤独”。其中,女性比男性的感受更明显^[10]。作为一个以美国偏远农村低收入妇女这一弱势群体为支持对象的行动研究项目,“聆听伙伴”在内容、过程和最终目标上均强调个人、社区和社会的变化。由于女性通常具有爱倾诉与交流的特点,“聆听伙伴”项目的各个环节对于我国女性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心理支持工作均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据统计,2013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 26894 万人,其中女性约占 33.6%^[11]。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们自己却还有不少人无奈地在贫困线上苦苦煎熬,过着“蚁居”、“鼠居”般的艰难日子,不能公平分享医疗、就业、教育、娱乐等社会保障性的改革红利。在传统社会背景下,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又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人群,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她们面临着多方面的排斥与歧视,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更多的困难与挫

折,其生存质量和心理状态必然受到影响。女性农民工问题不仅关系到其本身,还涉及到家庭和谐以及下一代的抚养教育问题^[2]。研究表明,乐观的生活态度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自我管理适应、周围环境适应等有积极影响^[3]。而这无疑与家庭氛围和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因此很有必要对女性农民工给以特别的关注。

有媒体报道,当前北京的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一些自发的组织,如“农民之友”“排忧解难”“打工妹之家”,这些自发团体由于源于农民工自身,与农民工沟通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为农民工排忧解难。不过他们也面临多种困境,包括团体工作者缺乏培训,素质较低,团体经费匮乏等,随时都有可能中断。此外,也有一些高校和社会团体深入农民工开展帮助,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团体往往很难坚持。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对这些农民工或社会团体进行资助,支持类似团体的建立,同时针对女性更愿意倾诉的特点,可借鉴“聆听伙伴”项目在促进参与者对话和提升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做法,招募和吸收专业人员担任团体指导者,这样将有利于催生一个健康社群文化的形成。大大小小散布在数千万女性农民工中间的社群,将能在她们缺乏信心、感到沮丧或压抑时,为她们提供倾诉的空间,给她们以勇气和温暖,让她们找到家的感觉,得到心灵的抚慰,并提升应对压力和解决困难的能力。

“聆听伙伴”项目的工作模式除了适合于在城市中处于边缘状态的女性农民工,对于生活在城市社区的女性老人、单身母亲,以及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同样具有借鉴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聆听伙伴”项目的工作模式,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和具体工作对象的特点等因素,对工作方式方法进行适当调整,使这一模式在社区工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相信必将有助于参与者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最终促进社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 [1] 詹姆士·H·道尔顿,等著.社区心理学——联结个体和社区:第2版[M].王广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2] Bond, L. A., Belenky, M. F., & Weinstock, J. S. The listening partners program: An Initiative toward feminist community psychology in ac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0 (5): 697-730.
- [3] Reinharz, S.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4] Shure, M. B., & Spivack, G. Interpersonal cognitive problem solving (ICPS): The PIPS manual [M]. Philadelphia: Hahneman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Sciences, 1974.
- [5] Shure, M. B., & Spivack, G.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 in childrearing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8.
- [6] 陈家付,刘相.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身心和谐[J].理论学刊,2010(12):75-78.
- [7] 高迎浩,程永佳.经济和心里的双重困境——城市流动人口生存状况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1-75.
- [8] 范艳萍.组织公平、社会支持与农民工组织承诺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44-47.
- [9] 张文霞,魏爱棠.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选择[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6(4):4-8.
- [10]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交往方式[EB/OL]. (2003-06-20) [2015-11-8].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li/mingong/350774.htm>.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 中国统计, 2014 (3): 6-14.
- [12] 张红杰, 刘凤阁, 刘辉, 孟祥红. 新形势下女性农民工生存现状及对策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4): 72-75.
- [13] 魏勇刚, 张希希. 进城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因素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64-69.

责任编辑: 陈于后

Listening to Partners: A Community Psychology Program for Reference

ZHANG Ailian, ZHAO Qing, LI Xi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China)

Abstract: Listening to Partners program is an intervention and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blended in with feminism and community psychology and it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impoverished white females in the isolated rural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gram is that many women in such communities have long been ignored and had littl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goal of the program is to enable participants to realize the power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nd to promote a wider range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individuals and groups 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a new living pattern of mutual assistance, mutual respect and self-reliance. The first step of the program is to choose and invite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n to carry out the peer group activities, including guiding the participants in feedback dialogues, creating a safe environment for conversation, re-presenting the participants' words in different forms, guiding the participants to think abou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ccomplishing and publishing the growth storie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holding a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the participants. Each Listening to Partner Program lasted for two years. The effect evaluation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positive changes in cognitive style, social support, living conditions and other aspects. At last, 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reference value of the program in the psychological support of the Chin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

Key words: Listening to Partners; female; community psychology; peer group; psychological support; effect evaluation